

茶座

总第三十辑 2012 第四辑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

历史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王学典：文明复兴，史学何为

葛剑雄：利比亚日记（2003年3月29日~4月10日）

邓可因：我和胡适作邻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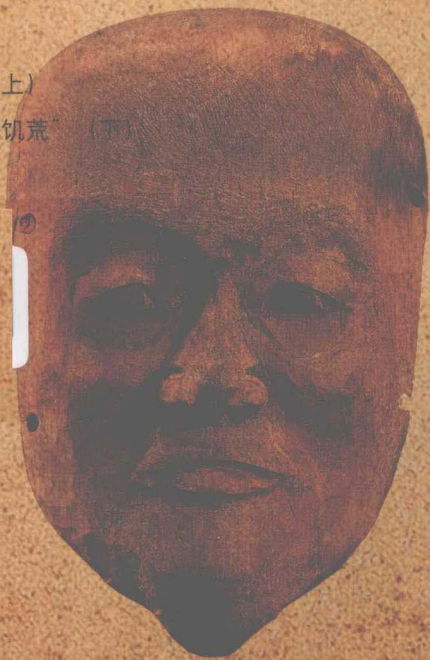
曹旅宁：黄永年与顾颉刚

郑会欣：小数点之谜——1947年孚中、扬子公司结构外汇事件

栗月静：胡佛与义和团的战争

睦达明：曾国藩和赵烈文密谈录（上）

散木：李劫人书信中的四川“大饥荒”（下）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XXX | 历史学家茶座30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陈 峰 绍 樱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 第30辑 / 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3

ISBN 978-7-209-07085-0

I . 历 ... II . 王 ... III . 史学—丛刊 IV . 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1195 号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制作 谢润萌

山东出版集团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82098014

购书电话 0531-82098021

邮局邮发代号 24-50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16 开本（172×232 毫米）10 印张 160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单位调换电话：0539-2925659）

文明复兴，史学何为

王学典

中国崛起是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中国崛起与其说是物质财富的激增，毋宁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这一复兴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意义已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已经跨越学科边界，几乎成为国内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都在通过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和思考，来展示自己的生机和活力。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声喧哗中，唯有历史学家缺席。实际上，最不应该成为中国崛起看客的就是史学。因为文明的复兴，仰赖于历史的被唤醒，而史学家担任着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唯一中介；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史学家们最有资格、也最应该成为积极的一员。绝不能因为历史学面对的是静寂的历史，就有理由躲避火热的社会现实。史学家完全应该也能够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必须认识到，在中国文明复兴的伟业中，历史学家肩荷着特殊的重任和使命。

坦率地说，当下谈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确有几分尴尬。史学在今日中国的影响力，不但无法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门类相提并论，即使与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相比也已落下风。哲学已通过理论上的新陈代谢融入国际主流话语，文学则以诺贝尔奖迈出了其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唯有史学、特别是历史理论，至今仍处在“文革”造成的巨幅震荡之后的盘整阶段，甚至还滞留在“亚文革状态”。造成中国史学目前窘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史家社会责任感在近二十年来的持续弱化是重要原因。古语云：“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中国崛起文明复兴，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更难得的机遇。而史学家们如果在这时更积极、更主动、更自觉一点，相信中国崛起的历史根基必将得到重新理解和诠释。唯其如此，史学才会改变目前被边缘化的遭际，重获知识界的尊重，重返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

目 录

卷首语

- 003 王学典 文明复兴，史学何为

封面文章

- 007 段战江 宣化辽墓：张世卿的世俗幸福生活

历史现场

- 022 杨倩如整理 冉昭德日记（四）
036 葛剑雄 利比亚日记（2003年3月29日～4月10日）

学坛述往

- 053 邓可因 我和胡适作邻居
056 曹旅宁 黄永年与顾颉刚
062 孟祥才 高全朴其人其事

重读民国史

- 071 王贞勤 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前夕的“青岛会谈”内幕
077 郑会欣 小数点之谜——1947年孚中、扬子公司结购外汇事件

人物春秋

- 092 王阿寿 孙科与陈世材
099 栗月静 胡佛与义和团的战争

旧案重审

- 107 刘 永 王直：海禁政策逼出来的“倭寇王”
113 周英杰 还原“滇案”中马嘉理的真实身份

公私档案

- 119 眭达明 曾国藩和赵烈文密谈录（上）
133 散 木 李劫人书信中的四川“大饥荒”（下）

掌故钩沉

- 145 肖 逢 夭折的晚清中国军工内迁计划
158 宁 可 毫厘记吃



宣化辽墓：张世卿的世俗幸福生活

段战江

—

对张世卿而言，他生活在一个很坏的时代，也是一个很好的时代。说很坏，是因为他身为汉人，却生活在契丹人的统治之下，而且时逢“比年以来，群黎凋弊”的辽王朝走向没落的年代；说很好，是因为他虽在异族的统治下，虽在一个破落的时代，却凭着家势和聪明，活得还不赖，甚至可以说相当成功。

张世卿是辽代时期的宣化人。早在他出生的100多年前，即公元938年，石敬瑭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不耻认比自己年龄还小的契丹主为父，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代价，换取自己做皇帝的梦想。被割让的十六州中，便有宣化（当时称作武州）。从此，曾是汉地的武州，便被改名为归化州，成为辽国的统辖之地。

对政治和历史的“被”选择，作为普通老百姓，往往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对他们而言，踏踏实实过好日子才是最重要的。而令张世卿幸庆的是，他或许生错了时代，却生对了地方。宣化所属的燕云地区，由于大部分都是平原地区，比较适宜农业生产，同时，平原与山地相接地区又比较适宜林果业的种植，因此自古以来，该地区既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又“有鱼盐枣栗之饶”，可谓“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是当时辽国境内最为富庶的地区，同时也是政府财政来源的重要基地。《辽史·营卫志》中便诚实地写道：“（辽）既得燕、代，益富饶矣。”张世卿家族，便世代在宣化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上繁衍生息，一直坚守本分，耕读传家，到张世卿一代，家产已经累积得相当丰厚，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地主。

大安四年（1088），辽国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农业灾荒，饿死者无数，甚至出现“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的恐怖地步，当时国力孱弱、政治腐败的辽廷，已无财力从国家层面赈灾救助，只好通过“立入粟补官法”，期望以“官帽换粮食”的方法，鼓励富户大贾们为国分忧，替民解困。此时，颇有眼光的张世卿觉得机会来了，他大手笔地拿出2500斛（约合150吨）谷物，救济灾民，以助国用。当时的皇帝被他“忠赤”之心所感动，特授“右班殿直”，后来又累升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云骑尉。这么一大堆虎气的官职，其实无了实职，都是荣誉头衔罢了。“右班殿直”是武阶名，为正九品；“银青光禄大夫”是文散官名，为从三品，但使用极滥，甚至加于吏职；“检校国子祭酒”是检校官名，在北宋前期检校官19阶中列第18；云骑尉，是勋级名，为正七品。

张世卿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虚衔，主要是因为辽代官职受到了唐宋的某些影响。自“唐建中赦许带宪衔，遇赦加恩，踵为故事”。北宋前期，禁军低级武官、三班院使臣及衙校等吏职，“初遇赦，即带银、酒、监、武，银谓银青光禄大夫，酒谓检校国子祭酒，监谓兼监察御史，武谓武骑尉”，由此可见，花里胡哨的荣誉称号，在当时只是朝廷笼络人心的一种面子工程罢了。但不管如何，对于张世卿来讲，虽未曾仕进，但捐来的是身份的提升，是家族的体面，这就已经足够满足了。

如果将张世卿墓室里的壁画与其他发掘的墓室相比，我们会发现最大的不同之处，便是其男性侍者远远多于女性侍者，守门侍立的就有6个，出行的有5个，此外备经的、备茶的、持匣的、持扇的、持巾的、持盂的、持拂尘的等等，几乎都是着正式官装的男性衙吏，甚至还包括一个契丹装束的持箱侍吏。也就是说，在生活排场上，张世卿完全享受了官方级的高级待遇。

此外，能证明他政治地位和特殊身份的，还有几个细节，一个是墓后室的门楣上方画有两条张牙舞爪、气势磅礴的龙的图象，甚至在墓前室“出行图”里，金鞍银辔的白马，配有一个精美的障泥，上面也绣有一条黑色的云龙。“学

唐比宋”的辽代帝王对于龙的崇拜，甚至比汉民族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龙是辽代最流行的图腾和吉祥物。虽说对龙的形象运用，辽代没有严格的规定，但至少有一定界限，在民间是不允许被滥用的。譬如与张世卿同时代的墓葬里，即便是下八里2区挖掘的M1号墓



八里2区挖掘的M1号墓的契丹贵族墓

契丹贵族墓室里，也都没有发现类似的图饰。此外，也唯有张世卿墓室壁画上的朱门上，画有金粉涂饰的凤凰图案。而我们也都知道，古代对于纹饰的使用，一般都是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的，由此可见，张世卿绝对是有身份的人。另一个细节是在已发现的墓室壁画里，张世卿墓里的散乐图，人数最多，级别最高，共有12个人，而且都着官服；而最直观的一个细节，是壁画“出行图”里，其中有一个侍者，手里托着一顶契丹式毡帽。按《辽史·仪卫志》“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的说法，画上的帽子可能就是朝廷赐予的象征身份的毡冠了。

张世卿的官员身份，幸亏也只是摆摆样子，因为他实在名不符实。“右班殿直”是武职，在宋徽宗官职改革时，改为“保义郎”，《水浒传》里宋江就曾有的“保义”之绰号，也就是说必须武勇之人方可担当。而契丹民族又是尚武民族，最大的特征就是当时凡契丹贵族都特别热衷于打马球。譬如下八里2区挖掘的M1号墓契丹贵族墓室里，其出行图与同时期汉人墓里出行图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出行必带马球杆。而张世卿或是太老的缘故，或是本身并不喜欢运动的缘故，他选择带着官帽骑马出行，更多是一种耍阔气、排场面的需求。

二

锦衣玉食，奴婢成群，又有着体面身份的乡绅张世卿，平日里最大的工

作当然不是骑马摆阔，而是在家焚香礼佛。

一方面，这得益于张氏家族“志崇佛教”的家传。张世卿的爷爷张匡正，就是个典型的佛教徒，“不食荤，不乐歌酒，好读法华（华）、金刚经”；他的堂兄弟张世本、张世古也都是“不闻腥血”的虔诚佛教徒，甚至家族里还有人出家成为僧尼，譬如张世古的孙女便出家为尼，而张世本的重孙金光奴也削发为释。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辽代君主普遍信佛，当时辽国境内遍造寺观，特别在张世卿生活的时代，正是辽道宗当政时期，崇佛更甚，一日祝发为僧尼者 3000 余人，一年饭僧尼三十六万，而且对僧人优宠备至，曾加封守志、智福二僧司徒之职，后又授园释、法钧二僧司空之职，给予非常高的政治待遇。也许是辽道宗太过迷信佛教，赏赐太过大方，使得全国僧尼都变着法去京城找他讨赏，因此还不得不于大安元年（1085）冬下诏：“僧尼无故不得赴阙。”而他下令修建的大昊天寺，耗费 18 万贯，后重修造塔又费 10 余万贯，总计在 33 万贯上下。与此相对比，当时朝廷下旨征户部欠款，全国才 44 万，由此可见耗费之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民间的信佛崇佛行为，也非常普遍，甚至用狂热来形容也不为过。

张世卿是大户人家，虽然礼佛的排场没有皇家那么大，但也是惊人的铺张。十数年来，每年都“筵僧一万人”，并设粥济贫。他也乐意修建公共形象工程，在城西建了一座砖塔，“高数百尺，雕镂金刚、梵行、佛顶、高王”，并派人常去打扫维护。此外，张世卿有一套别出心裁的礼佛方式。他在郊外花大价钱建了一座“幅员三顷”的大花园，种植的奇花异草达百余品，近四万株，然后又特别订制了五百只琉璃瓶，春、夏、秋三季，每天都派人采集鲜花，装在琉璃瓶里（张世卿墓壁上，就画有许多装在瓶里的鲜花），“持送诸寺，致供周年”。古往今来，这大概也算得上最浪漫的礼佛方式了。

在这座大花园里，张世卿还拥有自己的私家佛堂，供养着许多僧人，经常做法事，“诵法华（华）经十一万部，读诵金光明经二千部”。需要说明的是，法华经和金光明经都是镇护国家之经，若诵读此经，国家可获得四大天王之守护。也就是说，张世卿花钱做佛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既然为信仰埋单，最好是“公私兼顾”，为国家祝祷，也要为自己祈福。张

世卿是聪明人，自然明白这样的道理，因此，他供养的僧人，不但在道院里长年开讲金光明经，同时也开讲菩萨戒。受菩萨戒对私人有五种好处：一是十方诸佛愍念守护；二是临命终时，正见心欢喜；三是所生之处与诸菩萨为友；四是功德多聚，戒度成就；五是今世后世性戒福慧圆满。

辽天祚帝乾统二年（1102）十一月，朝廷下令，规定以后每年的四月二十九日（新皇帝耶律延禧的生日）为“天兴节”，全国庆贺。将帝后生日定为嘉节的传统从唐玄宗开始，此后为常规，代代相传，辽袭唐制，自然“踵而行之”。此时的张世卿，已经做了辽朝近十四年的名誉官员，好歹也算是朝廷的人，因此，与情与理，都必须对这个节日高度重视。

张世卿也正是这样做的。每年的四月二十九日，他都以“报上方覆露之恩”的名义，在私家的大花园里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不但私家寺庙供养的僧尼全部出动，还会从其他寺庙请来一些僧尼，做整整一晚上的法事道场。而对四邻八乡的善男信女、普通乡民，更是全部免费开放，并奉上“香花美饌”来招待。

按照中国传统的“礼仪”规定，在这样隆重的国家级庆典上，一定会有“酬神娱人”的乐队演出。根据张世卿墓里的伎乐图判断，当时现场应该有一支规模为十二人的大型乐队。这支乐队的人员皆头戴黑色无脚幞头，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表演的乐器共有：笙、篳篥、笙、腰鼓、大鼓、拍板、琵琶、横吹、腰鼓、十二管排箫等。从人物的官服装束和表演的乐器分析，这应该是一支高级别的乐队，或属于府、州的“衙前乐”，或者就是享受一定行政级别待遇的张世卿自己私蓄的散乐班子。辽代散乐的引进，也要拜儿皇帝石敬瑭所赐，为了表示“孝心”，他从汴京派来伶官，将中原的雅乐、散乐等高级艺术产品，贡献给契丹国主。

散乐是指与官乐相对的民间歌舞，这一乐舞种类在汉代以来不断杂入西域乐舞百戏，有浓郁的民间色彩。而他们演奏的节目应该是当时在北方特别流行的“大曲”。大曲是一种包含有器乐、声乐和舞蹈的大型乐舞表演形式，最显著的特征便是一人独舞，而且其舞蹈特征是甩袖、踏足，伴以快速的旋转。试想一下，春风迷醉、花香阵阵的夜晚，漂亮的大花园亭子中间，上演的是

一场怎样美妙的乐舞演出呀。

三

过着富贵闲适生活的张世卿，和大部分有钱人一样，寻求养生长寿之术是他最感兴趣，也是最操心的事情。

就精神信仰层面而言，张世卿也和中国绝大部分的传统乡绅一样，坚持多元信仰，除了敬佛外，他还“慕道崇儒”，三教皆奉。譬如，他自家的私家大花园里不但建有佛殿，也修有道院，此外，他还将道家非常有名的两本经书——《赤松子中诫经》和《孙真人福寿论》刻印、刊发出来，广为布施。赤松子是道教传说中的上古仙人，按东汉河北人高诱在《淮南子》中的注解，赤松子是上谷人，也就是宣化人。而孙真人指的是唐时著名的医师兼道士孙思邈，他在宋徽宗时被封为妙应真人，这两位神话级的道家“偶像”，在当时北方的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其实《中诫经》也好，《福寿论》也罢，都是劝人通过积德行善的办法来健康长寿的。用现在的科学术语解释，其实就是一种朴素的“社会行为医学”，正所谓“欲求身安，先求心安，欲求心安，为善即安”是也。在中国人眼里，通过行善事而“心安体舒”，才是长远的养生大道。

道家思想对于张世卿的影响，还有一个显著的事例，那就是饮茶。从张世卿爷爷张匡正墓、堂兄弟张世古墓以及张世卿墓里都存有的壁画《备茶图》中不难看出，饮茶在当时是一件多么复杂、多么庄重、又是多么美丽的事情。根据画里的茶器判断，张匡正墓的《备茶图》所描绘的，是当时从北宋流传过来的时尚点茶法。其基本程式是：在火炉（或火盆）上煮开水，从都蓝（茶器盒）里取出茶器，开始点茶。在茶盂（白瓷宽底大碗状）里放入适量的茶末后，一手持装有开水的汤瓶，一手持搅拌茶汤的银梗，一面逐渐注入开水，一面搅拌茶汤，待茶汤浓度适中，并搅拌出泡沫后，用瓢或木杓把茶汤分别斟酌进斗笠形的茶碗里，放在漆器茶托上，以供饮用。同时还要准备渣斗，以盛装剩余的渣滓。

有意思的是，可能是点茶法太麻烦的缘故，除了与张匡正同时期的四座

墓葬（皆由张世卿主持操办，统一迁葬的）画的是复杂的点茶法外，其他的，包括张世卿的墓中所画的备茶方法，都简化成普通的“煎茶法”了。正如宋代蔡襄在《茶录》里所言：

“茶之佳品，皆点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

也就是说，点茶法可能只是流行于辽地富贵人家的

一种时尚风潮，张世卿或是出于孝心或显摆的缘故，才如此展示罢了。而日常生活中，他可能更多采用的是当时辽地的大众煮茶法，即将团茶用锯锯碎后，“用银、铜执壶直接煨于炉口之上”的煮饮方式。

我们讨论的重点，不在于茶究竟如何沏，而在于饮茶本身对张世卿而言的精神享受和象征意义。兴盛于唐宋的饮茶文化，其实一直带有神仙思想的浓郁色彩。在道教文化里，茶一直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早在西晋时期，茶就被视为助于轻身换骨、羽化登仙的一剂灵药。正如西晋道士王浮在《神异记》中所言：“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而南朝时期的医学家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称：“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从这个意义上讲，饮茶可以说是张世卿慕道和修道的一种特殊途径和有效载体。

另外，由于饮茶带来的“清心、寡欲、醒神”的生理功效，茶自唐代以来，也逐渐成为佛教徒参禅修身的重要辅助品。而对于虔诚的佛教徒张世卿而言，饮茶自然成为一举多得，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和修炼功课了。耐人寻味的是，在其墓葬壁画中，茶饮曾两次重复出现。一幅是墓后室西壁描述的备茶场面：一侍吏手把茶盏，另一侍吏手持执壶向盏内冲汤，桌上置都蓝、茶孟、盏托等器皿，桌下火盆中置一短颈执壶。与其相对是墓后室东壁的备茶场面：两侍吏立于方案前，一人双手将一黄色盘口汤瓶置于案上，另一人右手指向墓



张匡正墓《备茶图》

内并回头与前者私语，案上摆着一个盃顶函盒和一个黄色熏炉，还有两摞经卷，值得注意的是这张摆着经卷和供器的经卷桌上还摆放着一个黑色茶托，上承一个白色茶盏。如果我们假定两壁对应的画面分别是描述墓主人生前早起和晚睡时的侍候场景，那么就不难判断，饮茶在张世卿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了。当然，他吃完茶，是既读佛教禅宗经典《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读道家经典《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凡是修行的智慧，无论佛家，还是道家，他都愿意以虔诚的心态，一一照单全收。

除却敬佛慕道，张世卿还很崇儒，虽说他还称不上知识分子，但至少识文断字，加上官员身份，也算是“准士”阶层了。张世卿有着浓郁的文士情结，对于文化以及文化人，有着天然的好感。譬如当时有一位叫张昭回的落魄文人，“少习文墨，举进士业，辞翰之场，频战不利，虽三赴御殿，犹未捷于甲乙”，虽说仕途不顺，生活潦倒，但张世卿一点也不嫌弃，而是“相待与同气，无异而分义”，将这位“翁殊母别”的同乡，列入族谱，认作自家兄弟，并将为父亲撰写墓志铭的光荣使命交付给他。张昭回有可能后来在张氏家族中扮演了家庭教师的身份，因为张世卿的儿子张恭谦，长大后“曾隶北枢密院，敕留承应”，这说明与张世卿相比，他儿子的文化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因为北枢密院是辽王朝的最高行政机构，作为吏职的“敕留承应”，也算是国家级公务员，对文化水平的要求肯定不低。想来这自然是张恭谦自小受到良好教育，得到高人指点的结果。

佛、道、儒三教和谐共处，相互融合，其实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强劲的民意基础，在张世卿生活的时代，也颇为流行。譬如在他给叔叔张文藻修建的坟墓里，便画有一幅“三老对弈图”，一人官服着装，一人道士打扮，一人僧者模样，三人一起下棋，场面祥和，其乐融融，正是三教合一的最好象征。而张世卿能将三种信仰、三种文化有效融合在一起，既有“出世”的豁达和潇洒，又有“入世”的务实和精明，也足已说明他是个聪明人。

四

大安九年（1093）四月十五日，对于张世卿及其整个家族而言，是一个

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他将爷爷张匡正墓、叔叔张文藻墓、堂兄张世本墓等几座（目前发掘的情况显示，同时期下葬的还有两座墓，编号M6、M9，因已被盗毁，无法判断墓主，从墓的规制和身份推断，很有可能是张世卿的伯父张文纪及父亲张文震的墓）家族墓葬进行了扩建升级，以此“光宗耀祖”，在乡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家族势力和个人孝心。

这一年，张世卿51岁，是他被朝廷封赏的第5个年头，自己活得顺风顺水，也觉得有必要让祖宗沾沾光了。正如他所言：“虽室家之事已修，而祖考之茔未还增广。”对张世卿来讲，那是他最得意的一段时光。虽说自己只是被封了一个九品的小官，而且还是虚职，但对世代为农民的张世卿家族而言，已经是“一步登天”的莫大荣耀了。整修祖坟是大事，也是好事，因此张世卿在这方面的投入毫不吝啬。

他为爷爷张匡正修建的是前方后圆、墓室全长达6.2米的双室砖墓。墓门楼采用了砖雕仿木结构，并有漂亮的建筑彩绘和花卉纹饰。此外，按照当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礼仪，他还请当地最好的民间艺人，通过绘画的方式，为爷爷在阴宅里安排了盛大甚至豪华的服务团队。首先他在前室西壁上为爷爷安排了一支由七人乐队和一个舞者组成的伎乐歌舞团。这是一支全由年轻女性组成的女子乐团，堪称古代版“女子十二乐坊”，颇有盛唐遗风。其中演奏的7人，男装打扮，头戴不同式样的簪花幞头，身穿各色圆领窄袖开胯长袍，分别演奏曲颈琵琶、横吹、芦笙、箏、拍板、腰鼓和大鼓。而另一个担任独舞的年轻女子，则梳高椎髻，上穿斜领绿色缣衫，下穿红白小团花蓝锦地宽腿裤，外罩白地红道开胯百折裙。在前室东壁上，他为爷爷安排了一组备茶的仆役，包括两位端茶的汉装妇人，一位髡发的契丹男仆，一个碾茶的汉家童子，一个吹火的契丹童子。或许是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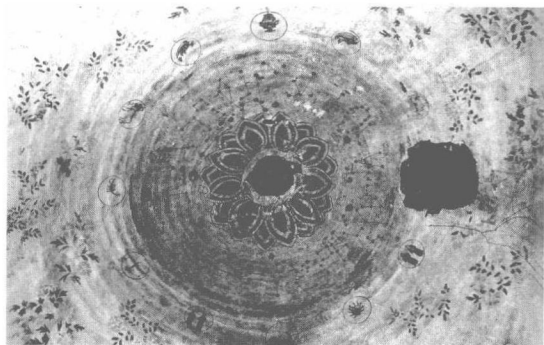


张匡正墓《散乐图》

增添人间烟火气，他还令画师增添了两只嬉戏的小狗。门口安排的是两位持仗的胡人门吏，外形彪悍，令人望而生畏，颇有安全感，门内安排的是两位头戴直角幞头，身着红色官袍的汉人文吏。

身为贤孙的张世卿，对于爷爷“地下生活”的安排，不但要求豪华，而且要求舒适。在后室，根据爷爷的生前喜好，他不但在后室放置了摆有经筒和经卷的经架，而且还搁了一张摆放着笔墨砚台和两个茶盏的方桌。此外，还特地安排三位侍女侍候爷爷，一位负责日暮燃灯，另两位则负责晨起梳妆，一位持镜，一位持水钵和毛巾，捎带负责爷爷读经时倦了醒神之用。大概担心地下阴冷，细心的张世卿还特地在方桌下放置了一个很大的炭火盆，供爷爷取暖用。在后室北壁的砖雕门楼两侧，还各摆放一只牡丹花缸，以示美观。

有意思的是，为了让爷爷生活在“洞天仙境”，张世卿还特地命画师在后堂绘了两幅仙鹤水草图，并在墙上画了大量的云气纹装饰。在中国道教文化中，仙鹤是得道成仙时奔赴仙境的主要交通工具。如《陶侃传》言：“侃丁母艰，在墓下。忽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仪服鲜洁，知非常人，随而看之，但见双鹤飞而冲天。”又如《历代名画记》卷九曰：“司马承祯，字子微，自梁陶隐居至先生四世，传授仙法。尝画于屋壁……二十三年尸解，白云从堂户出，双鹤绕坛而上……”得道成仙、驾鹤西去的故事，在民间有着强盛的生命力，张世卿派人画仙鹤，肯定是受这些故事的影响。但在阴间地府，又如何羽化升天呢？化作白云倒是一种办法，但不太保险。不过，张世卿有的是办法。他派



张世卿彩绘星图

人将爷爷墓的后室上方，修成圆形穹顶，然后彩绘二十八星宿的星空图，象征着“浩瀚无边的苍天”，而在中心重瓣莲花藻井里，则放置一面大铜镜，如天空日月一般。这样一来，爷爷既可以驾鹤升天，直接成仙，又可以在莲花佛祖的护佑下，化而为神。